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多维视角的哲学探索

黄柏森◎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多维视角的哲学探索

黄柏森◎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维视角的哲学探索 / 黄柏森著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6. 4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ISBN 978 - 7 - 5161 - 7759 - 4

I . ①多… II . ①黄… III . ①哲学—研究 IV .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147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苗
责任校对 季静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448 千字
定 价 9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黄枬森（1921.11.29—2013.01.24），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名誉会长；第一、二、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五个一工程奖”，吴玉章奖，多个国家级、省部级科研教学成果奖获得者；北京大学蔡元培奖、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人学、文化理论四大研究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重要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当代学术思想界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面旗帜。

总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既是时代发展和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理论工作者所肩负的重要职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处理好传承与发展的关系。这里讲的传承，既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传承，同时也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传承；这里讲的发展，既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不断创新，同时也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的突破与提升。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是重要的，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及其成果的传承与创新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两种传承与发展实际上并不是各自孤立进行的，而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与发展固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内容本身的研究，同时也包含着后人的理解和阐释，不可能离开后人的研究来孤立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和发展。因此，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对后人的传承与发展加以重视和关注。这也正是我们组编这套《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的初衷。

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发源地，具有悠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开设唯物史观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冯定教授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设起了重要的组织、推动作用。1978年以来，黄枬森教授等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拓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使其成为全国重点学科。

多年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其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就是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成为本学科研究的重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成功开创，形成了独特

的研究特色。由黄枬森等教授主持编写的以及与国内同行共同编写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全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学科在保持原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根据新的发展的需要，逐渐拓宽了研究领域，形成了这样几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一是文本研究，包括文献研究和文本内容研究；二是基本原理的专题性研究，特别是历史哲学的研究；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重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四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主要结合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对相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人学和发展理论的视角予以新的探讨。这些研究方向的确立，意味着研究不再仅仅限于传统教科书的框架，同时面向现实问题研究，从而走向新的融合。

对于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学术界多年来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强调研究的学术性，有的强调研究的现实性，彼此形成不同的倾向和主张。实际上，二者并不构成矛盾与对立，而是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并且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不能正确理解经典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正确地阐释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能仅仅限于这样的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变为文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一些原理的“诠释学”“考据学”，无益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也是一个发展、开放的系统，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伴随实践的发展，许多基础理论也要不断深化、调整和完善。关注现实问题，加强“问题导向”，一方面可以使文本中曾被忽视、误解以至被遗忘的思想、观点得到新的重视和开掘，另一方面可以给文本中许多思想赋予新的当代意义，从而激活其思想资源，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就此而言，加强现实问题研究，又会有力促进基础理论研究。实现二者有机结合，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化和发展，这也正是本学科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拓展研究方向与领域的动因所在。

收录在本论丛的书目，都是本学科老教授的研究成果。这些老教授虽已离开教学岗位，但不少人始终是“退而不休”，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园地里辛勤耕耘，成果不断，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本论丛写作的时间来看，既有过去撰写的，也有新近创作的，有的完全是近几年研究的成果；从其内容来看，涉及的论域比较广泛，既有关于马克思

主义哲学史、经典文本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又有关于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从其关注的重点来看，既有基础性的问题，又有前沿性的问题；从其研究的领域来看，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涉及的各种领域，又有与其相关的研究领域。可以说，这些成果是这些老教授长期研究的真实记录，是他们探索轨迹的生动描绘，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绚丽画卷。

本论丛只反映了本学科过去研究的一个大致图景，并未体现其研究的全部历史和现状。收录的书目主要反映了作者在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或代表性观点。尽管各位作者研究的重点不同，旨趣各异，但其目标指向则是共同的，这就是不断深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求发展、创新。正是围绕这一目标，各位作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本论丛所收集的这些研究成果是和作者们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作者都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出生的，大多是在新中国建立后走进大学校园，而后留校任教。他们都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其学术生涯又是同改革开放的历程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些特殊的经历，使这些作者对社会、人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独特而深刻的体认和感悟。这些研究成果均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和个人体验的印记。今天看来，在这些成果中，尽管有些话题可能有些陈旧，某些看法也不一定新颖，但其确实反映了这些作者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独特思考和艰辛探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历程及其经验教训。总体来看，这些成果是本学科长期积累的宝贵财富，它为本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因而是其发展的重要阶梯。

传承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同仁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没有忘记自己的天职，一直以高度的热忱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之中。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只要充分继承和发扬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光荣传统，锐意进取，不懈努力，就一定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我们将会把新的成果集中起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与当代”丛书加以出版。

近年来，本学科的发展得到了陕西帮建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良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建议并捐资设立了“黄枬森与北京大学马克思

主义哲学学科发展”项目（简称“黄枬森项目”），为本学科的教学、科研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深表感谢！

本论丛的出版得到了陕西帮建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良先生和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的资助；北京大学哲学系对本论丛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本论丛的策划和出版作了很大努力，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论丛编委会

2016年4月

代 序

我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我的终身事业，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

我在小时候，也就是从六七岁到十四五岁，除了两年上小学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中国古代的典籍，16岁才上初中，18岁才上高中。在蜀光中学上高中的时候，我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潘梓年的《逻辑学与逻辑术》，还有一些苏联哲学家的著作，所以我在高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有了一定的兴趣。后来上大学，开始学的是物理，一年后我转到哲学系，在哲学系主要学的是西方哲学，这时候很少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再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1947年到北京大学复学以后。北京大学民主运动已经红红火火开展起来了。那时民主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地下党宣传工作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读书会。我在1947年参加了北大“腊月读书会”，在读书会里再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特别是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都是那个时候学习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作为哲学系的研究生，被学校调去从事政治课的工作。我从此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专业工作。1951—1952年，我在人大进修了一年，学习了很多马列著作，其中包括哲学著作。后来做了北大苏联哲学专家的助手，帮助他培养马克思主义研究生。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逐渐成了我的终身事业。

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另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以前我主

* 本文发表于《黄柏森自选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出版，《高校理论战线》2000年第3期，《中国大学教学》2002年第7/8期，《哲学的科学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要是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列哲学著作，同时自己也作些研究。但这种研究现在来看是不深入的，不系统的。我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而且对马列的哲学思想有所发挥，也就是说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是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以后的事情。

把我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综合起来看，我觉得我在四个方面作了一些研究，也提出了一些经过我的独立思考而提出的见解。下面就这四个方面，谈一些我的基本看法。这四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学和文化理论。

一 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大家知道，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除了极个别的学校开设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课程以外，一般来讲是没有这门课程的。北京大学也只是苏联专家在20世纪50年代讲过一遍，以后就再没有开设过这门课程了。那时候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列原著。原著是怎么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只有学习、领会的任务，不能加以研究，不能加以评价，当然更不能加以批评。那时的观点是，经典作家的言论句句是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是真理加真理的过程，没有什么功过是非可言。

这种观念实际上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是存在的反映，存在发展了，思想当然要发展；社会发展了，哲学当然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思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总有功过是非的问题，总有一个修正过去的观点、丰富过去观点的问题，就是发展的问题。因此，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个历史过程。马列原著是历史的产物，应该有一门科学叫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厘清这些思想的发展，来评价在历史上所提出来的哲学思想的功过是非。

由于改革开放，由于真正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于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样一门科学或课程，就较快地得到了大家的认同，逐渐在各高等院校开展起来了。我一直参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学科和这门课程的建设和研究的工作，自己也做了一些工作，发表了一些看法，起了一些作用。在马哲史方面，我觉

得我在两个问题上的观点可以谈一谈，一是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评价问题，二是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和理解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西方的影响，也由于改革开放，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反人道行为的反思，学术界提出了重新评价人道主义的问题，批评过去对人道主义全盘否定的态度。提出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是应该的，应该给予人道主义一个公正的评价，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在那个时候，也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就是现实的、科学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以人作为它的出发点、核心和归宿。这种观点的根据主要是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它认为这部手稿是马克思的成熟的著作。理论界就此开展了一些争论，我也发表了一些看法，写了些文章。我认为这部手稿并不是马克思的成熟的著作，而是过渡性的，是马克思从人道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过渡的著作，包含了人道主义的因素、空想社会主义的因素，同时也包含了唯物史观的因素、科学社会主义的因素。更确切一点说，它是马克思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向科学社会主义者、从人道主义历史观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过渡的一本著作。马克思确实在这部书里面肯定了人道主义，以人道主义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过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的劳动的异化，社会主义就是把这个异化加以扬弃。他用这个观点论证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个观点没有摆脱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必须消灭，就因为它是违反人道的，即人道的异化，而社会主义是最人道的，是人道的恢复。马克思接受了这个公式。但马克思对人的看法，跟空想社会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有所不同。他们所说的人的本质或人性，就是理性，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理性异化了或丧失了，又加以恢复的过程。而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不是理性，而是实践，是劳动。所以他就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劳动异化—消除劳动异化”的过程。他讲劳动，讲实践，也就是讲人的经济生活，这里面就包含了这样的思想，人的经济生活是最根本的。后来他从这个思想出发，对人的生产，人的劳动，人的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了生产运动的规律，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于是他就彻底抛弃了人道主义的历史观，而实现了从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向唯物史观的飞跃。这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两个论著

里面完成的，所以我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作为历史观是错误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是同唯物史观对立的。人道主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应该肯定的。马克思并没有扬弃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原则的人道主义思想，只是抛弃了人道主义历史观。

《哲学笔记》不是一本普通的著作，它是由列宁的许多笔记编纂而成的。《哲学笔记》的大部分内容是摘录过去哲学家的言论，他只是在这些摘录的旁边作了些批注，多数是三言两语，但包含有很多很重要也很精彩的思想，虽然这些思想都没有展开，更没有加以系统化。因此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甚至读懂，都是比较困难的。20世纪50年代，这本书就已经翻译出全译本，但是大家都感到难读，主要的困难是列宁所作的大量的摘录，而这些摘录如果不懂，也很难深刻理解列宁的批注。那时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要把《哲学笔记》读懂，就得先把列宁所作的摘录读懂，但是苏联也没有做这样的工作。1960年左右，哲学系资料编译室的一些同志组织起来，从事《哲学笔记》的注释工作，专门注释那些不容易懂的地方。我们先把列宁摘录的原文找出来，对原文进行一番注解，然后再注释列宁的思想。60年代初就完成了这个工作，并在内部铅印交流，80年代初公开出版。这个注释对于哲学专业的学生和哲学工作者读懂并进一步研究列宁的《哲学笔记》，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还想提的是，我在跟同志们一道从事《哲学笔记》注释工作的时候，对列宁所提出来的辩证法要素16条，提出了我自己独特的看法。这16条是很著名的，过去有不少哲学家认为这16条就是列宁的辩证法体系，并一条一条地加以发挥。我经过研究，特别是研究了这16条的手稿，发现这16条按照原有的形式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前7条有一定的顺序，而后9条则是零散的，它们实际上是分别从属于前7条，只有分别插入前7条里边，才能形成一个体系。后来我发现苏联的哲学家凯德罗夫也有这样的观点，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我这个观点60年代初曾经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过，凯德罗夫的类似观点晚些时候才公开发表。

近20年来，我在马哲史方面还做了更多工作。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马哲史，是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我参加了此书的撰写和统稿工作。后来又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施德福、宋一秀共同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3卷本），大致有100万字，得

到了国家教委的优秀教材奖。另外，我还同人民大学的庄福龄、中央党校的林利共同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这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初是“六五”的重点项目，后来又是“七五”的重点项目。1983年立项，一直到1996年才出齐。8卷共400万字，获得了1997年“五个一工程”奖和吴玉章奖，1999年又获得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等奖。几年前，我还受国家教委的委托，主编了一本马哲史教材，于199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二 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在这方面，最近20年来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我没有参加很多关于原理教材的编写，只是参加了一本由肖前同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编写，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我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经典作家那儿，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第一个完整体系是苏联专业哲学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来的，后来斯大林在《联共党史》的4章2节里提出来的那个体系，也是把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哲学体系简化和改造的结果。这个体系在30年代初已传到中国。这个体系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成两大块。一块叫作辩证唯物主义，一块叫作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是三个部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这个体系一直是世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对这个体系作了若干改变，主要是在里面贯穿了一些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但是框架仍然是那个框架，可以说今天也还没有完全突破。这个体系20年来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许多人也作了很大努力，想突破这个框架。现在势力很大的一种观点，就是要用实践唯物主义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然，究竟什么是实践唯物主义，意见也存在非常大的分歧，还没有达成什么共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我有几点看法：

第一，对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我认为不能根本否定，而应该抱一种坚持和发展的态度，即一方面要肯定它的科学性，一方面也要认识它的局限性。

具体讲来，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几点是科学的，是应该肯定的：

1. 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把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来建设的，也就是说哲学知识应该是一种客观的知识，应该力求同客观世界相一致，就像我们对于一般的科学所了解的那样。

2. 因此，它认为哲学应该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3. 主张哲学应该有一个体系，而且按照一定的原则来建构哲学体系。这个原则最主要的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

4. 旧的哲学体系里有许多内容都是正确的，是经过实践的无数次检验而被证明了的。

5. 旧的哲学体系强调哲学的应用价值，认为哲学有改造世界的功能，哲学应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

旧的体系也有它的局限性，或者说它的不足之处，其缺陷大致有三点：

1. 从内容上讲，旧的哲学体系有许多空白，或者说有许多薄弱环节。譬如人的问题、主体性的问题、价值的问题，这些都是不足甚至是空缺的地方。

2. 它没有充分吸收 20 世纪以来时代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所提供的新的内容。它的内容同 20 世纪的整个的世界形势的发展以及 20 世纪科学的新发展不相适应。

20 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国及其关系和格局有了很大的变化。以高科技为龙头的社会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了，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有了巨大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信息交流网络化，使世纪之交的地球日新月异。20 世纪前半叶，相对论、量子力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后半叶系统科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科学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西方国家在社会研究和哲学方面也提供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成就。对这些，旧的哲学体系都没能够充分吸收。

3. 即使按照它原来的建构体系原则来说，旧的体系也没有能够充分地加以贯彻。旧的体系对于哲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哲学体系怎样体现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这个原则，没有讲清楚，存在的问题是很多的。

所以我认为，对旧的哲学体系应坚持它的基本的、正确的东西，而对它的失误和不足的地方，加以修正，加以丰富，加以发展。

第二，我想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怎样来建设的想法。

我认为应该首先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然后根据对象来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以及它的体系。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只有一个对象，那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或者说宇宙的整体和一般。但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有内容及其重要性，它的对象不是非常单纯的，它的对象有三个层次，或者说是三个具有一定重叠性的对象，因而哲学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按照一般表述方式，我们如果把宇宙观叫作哲学，其他层次的哲学可以叫作部门哲学。

第一个对象或者说最大的、最高层次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客观世界，就是我们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世界，当然还要包括它的过去与它的将来，它的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部分。因此，哲学的第一部分就是宇宙观，即把客观世界作为整体来研究，也叫世界观，过去曾经叫作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它所研究的是这个世界的整体，是这个世界的最一般的东西，即对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领域都起作用的普遍的东西。世界观里面应该包括自然观，一般理解的自然界是排除社会的，好像是社会以外的东西，实际上自然界是无所不包的，自然界包括社会在内。当然可以建立和发展一门学科专门研究社会以外的自然界，但是在一个体系里要把世界观同自然观区别开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必然会有大量的重复，所以世界观应该包括自然观。

第二个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因而哲学的第二部分是历史观，也就是经常讲的唯物史观。由于这个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所以人类社会历史观也就是一般的社会论，或叫作一般社会学。在这里面还可以包含一个小的部分叫作实践论。实践论近年来谈得很多，几乎有代替整个哲学的趋势。我认为，实践论包含在历史观里面，因为实践是一种人类社会的现象，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但它不等于整个人类社会，更不等于整个宇宙。所以，像旧的体系那样对实践没有作专门的研究，是不对的，但是把实践论摆在历史观以外，甚至用它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过分了。应该对实践作专门的研究，即实践论，并把实践论包含在历史观里面。我们还可以把人学作为这一层次的一门部门哲学，下面将对人学作些介绍。

第三个对象是意识，因而哲学的第三部分就是意识论，或者叫作精神

论。精神、意识都是一种社会现象，意识论应该包含在历史观里边，但由于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性，意识论可以作为单独一部分加以论述。在意识论里边，还可以包含几个小的部分，就是经常谈到的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过去把认识论包含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里边，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因为认识是一种社会现象，应该讲清楚了历史观以后再来讲认识论。认识是意识的一部分，而且是基础性的一部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旧体系里面没有价值论，虽然谈到许多价值问题，但是对价值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近 20 年来，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这是很好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部分，价值论应该包含在这个体系里边。方法论过去我们是经常谈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方法论，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这样讲当然没有什么错，但这是不确切的。准确地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方法论”应该是以方法为对象来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可以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包含在意识论或者精神论里边。方法不等于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就是由世界观、历史观、意识论三部分组成。世界观可以简单地叫作辩证唯物主义，说得确切一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第二部分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部分是辩证唯物主义意识论。所以辩证唯物主义是其总的称呼。而由于世界观在这里面居于最高的地位，所以可以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第三，我认为应该按照一定的原则来安排这些哲学问题和哲学原理或范畴。

根据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的原理，哲学范畴应该是成对的，这一点过去没有做到。黑格尔认为否定之否定是哲学的核心，他的哲学体系做到了一分为三，整个体系按正反合运转。我们不必搞一分为三，但范畴应该是成对的。哲学体系应该从存在开始，存在是最抽象的，最一般的。从抽象逐渐走向具体，整个体系应按照这个原则来安排。这个原则包含从简单到复杂，从静到动，从表到里，从客观的东西到主观的东西等内容。这样就可形成一个对立统一的哲学范畴体系。我从前曾经根据列宁《哲学笔记》关于构造体系的思想，构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提出了 36 对范畴。但这仅仅是一个尝试，而且没有包括 20 世纪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科学的研究的成果和世界哲学新的进展。所以我并不想用这个体系来取代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三 谈谈我对人学的看法

第一，我认为建立人学学科是非常必要的。

唯物史观里有些关于人的论述，但是谈得比较多的是杰出人物的贡献和作用，对于一般的人没有进行专门的论述。仅仅从基础学科的完善来讲，建立一门人学的学科是必要的。“人”是一个非常明确、非常清楚的研究对象，但是奇怪，我们过去没有建立起一门学科来对人作整体的研究。现实生活也非常需要，因为现实生活接触到人、人的学科、人的知识、人的理论、人的观点太多了，如我们谈要提高人的素质，要发挥人才的作用，要教育人、培养人、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等。所有这些，都需要由一门学科来对人进行整体的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缺乏人学，是忽视人，不要人，甚至是敌视人的，认为唯物主义就是不要人的哲学，忽视人的哲学，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挑战，要求马克思主义对究竟什么是人，什么是人学，作出正面的回答。

第二，我认为人学有明确的对象。

一个明确的对象是任何一门科学或者学科的首要前提，没有明确的对象，这门学科无从建立。有了明确的对象，即使现在还没有建立，只要有需要，通过我们的研究，也可以把一门学科建立起来。人学的对象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我们都是人，活生生的人，成天都在接触人，接触现实的人。完全可以以人为研究对象，形成一门严格的科学。

人学是把人作为整体来研究，不是研究人的某一个方面。人学同人的科学有区别。人学当然是人的科学，但是它只研究作为整体的人，而人的科学包括研究人的任何一个方面的科学。我不同意近年来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哲学就是人学。这种观点对哲学的发展和人学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从我们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得出来，哲学的概念是比较含糊的，实际上哲学是一个科学群，是多门科学。如前面所理解的，它包括宇宙观、历史观、意识论等。如果说它的对象是人，那么你指的究竟是什么哲学呢？如果说宇宙观的对象就是人，那就把宇宙观过分地缩小了，因为宇宙观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宇宙，人在宇宙里是微乎其微的，微不足道的，怎么能把宇宙等同于人呢？有人说宇宙观研究的